

古镇丰利是镶嵌在江海平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,范公堤如游龙横亘在远郊,串场河汨汨穿镇流过。文园古楼见证了当年的诗酒盛会,石板街留下了多少岁月沧桑?盐河码头的喧嚣尽管早归于沉寂,但恍惚间工脚号子又在叫响。复建中的大圣寺唤起了尘封的记忆,醉枫庐的沙盘将古镇昔日的风光展现得一览无遗。而悟园又另有一番意境,穿越历史,承载当今,激励一代人奋发向上。

丰利是古老的,她从煮海走来,上千年的历史大多以“亭”、“场”的身份亮相。丰利又是年轻的,以“市”“镇”命名之,不过是近百年的事情,不时还留在老人们的嘴上。

“丰利”地名是吉祥的,蕴含商机,乃厚利吉兆。丰利地名的传说又是美丽的,多维度的,引人遐想。

有人说,丰利在唐朝初年是个海湾港汊,每逢涨潮,波浪汹涌,水天相接,常常夹以狂风呼啸,漆黑一片,古名“黑风口”。

有人说,当年薛仁贵跨海征东,就是从这里渡海的。唐朝开国大将尉迟恭之子尉迟宝林曾在此建造大圣寺,寺殿梁上就镌有“尉迟宝林监造”的字样,时至今日,一些耄耋老人聚在一起,还津津乐道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亲眼目睹。丰利人历代口

侧发展。经过一段时间,便慢慢形成了平行于海岸线的长街,由此奠定了丰利丁字街的雏形。此时的土井变成了人居考古学上真正意义的“市井”,它被时人称为“当街井”。当街井与大圣寺一样,是丰利文明发祥的见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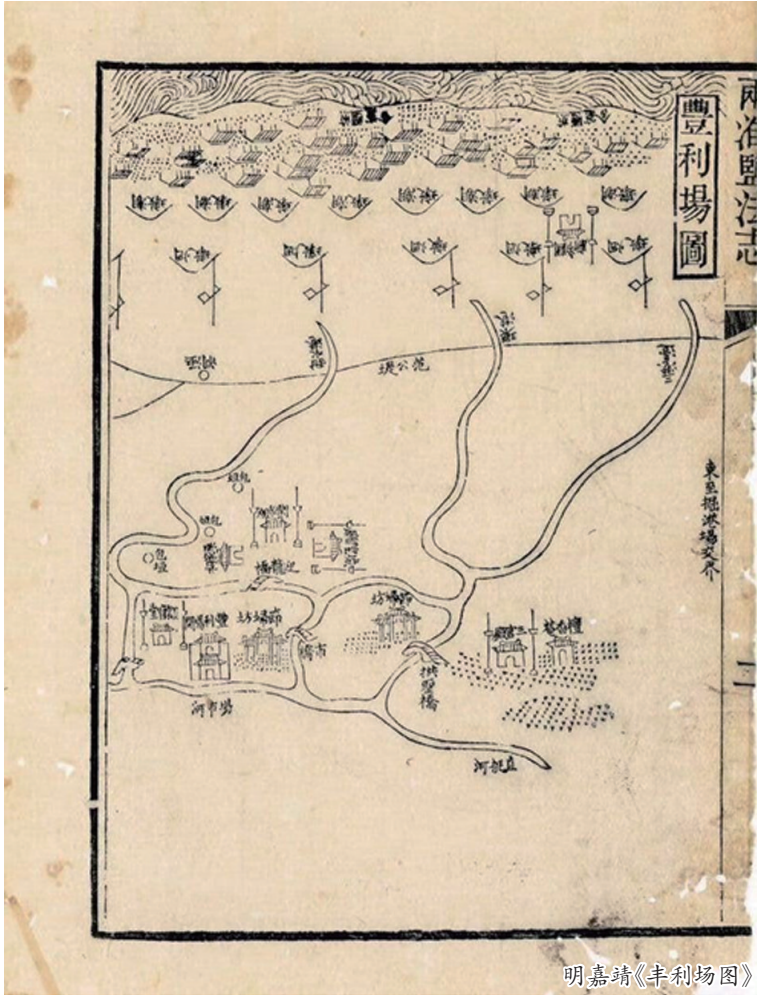
光阴流转,大圣寺前的两棵枫树也日渐茁壮繁茂,令过往者注目,古镇因而初名枫树镇。

与枫树有关的传说异彩纷呈。相传,早年有徽州歙县籍妇人偕其女来到这里,寻找多年前外出经商未归的丈夫,母女俩长途跋涉,历尽艰辛,一路流浪而来。由于人地生疏,食宿维艰,只能栖息在大圣寺山门边上。连日打听亲人的下落,可是一天天过去,却音信渺茫。

一日清晨,母女俩在大圣寺枫树下,正为亲人的安危和自己的去留忧虑时,隐隐约约听到树冠上有人说话:“罢了!罢了!汝等不必再费心劳神了,你们的亲人已经不在人世,但此地是块‘宝地’,将是你们母女俩的安身之处。如能勤劳,必有后福。若想寻宝,且随我来——”母女听着、愣着,好似身在梦幻之中。可此时已经日上三竿,连忙抬头寻望,只见蔚蓝的天空,一朵白云像盛开的莲花,缓缓飘向东北方。一阵晨风,抖落树枝上的大片露珠,

# 丰利地名传说及沿革考略

□ 王继臻



明嘉靖《丰利场图》

耳相传,“先有大圣寺,后有丰利场”。

唐睿宗太极年(712),大圣寺旁生长枫树两棵,日渐茁壮。此前,先民们苦于地表水无法饮用,到处寻找水源。后在寺前半里许掘土井一口,汲得甜水。人们大喜过往,遂加盖石板,用心呵护。赤卤之地发现了可饮之水,意义非同凡响,水孕育了生命,水也带来了希望。小小的渔村亭场,有井水可饮,人口蕃播,寺庙既立,香火渐旺。然而彼时由于潮涨潮落,变幻无穷,先民们一开始只能小心翼翼地从大圣寺向南开始搭建简陋的草房,就这样一间间、一户户一直搭到土井边上,渐渐形成了垂直于海滨的北街。……

光阴荏苒,不觉到了宋元年代。捍海堰终于从遥远的北方,跨越黄沙洋口,修到了丰利的近旁。桀傲不驯的大海暂时低下了头,商灶庶民齐声欢呼,人们看到了与大自然分庭抗礼的力量。渔盐稼穡,衣食之殖,当初的小渔村、小亭场,如今已升格为催煎场。人烟辐辏,商户聚集,于是又从土井向东西两

母女俩惊诧地相互张望,莫非这样云之上就是指点出路的“仙人”?

于是母亲领着女儿,似信非信地顺着云朵飘浮的方向走去。约走了10多里,来到东北方向的港湾。举目远眺,只见辽阔的沙滩与无垠的大海相拥,蓝天白云下渔帆点点,远处影影绰绰有一簇簇的人群在蠕动。于是急促促往前赶,一探究竟。走近处,原来是一伙伙人,正哼着渔家的号子,在忙着踩挖什么,相问方知是取文蛤。母女二人想,“仙人”所指宝地的宝物,想必就是此处此物了。

从此,母女俩学会了踩挖文蛤,以度日。风餐露宿,起早贪黑,勤劳的汗水终于换来了回报,不久,就在大圣寺枫树的不远处搭起一间草房,安下了家。

几年以后,女儿成人了,与本地一个灶民的儿子结为夫妻。俗话说:“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。”一家有三双勤劳的手,日子越过越好。后来拆了草房,盖了瓦屋,全家其乐融融。

有一年,老人带着女儿、女婿和刚出生的孙儿回歙县老家探亲。乡

亲们见到这一家其乐融融的景况,又听说了他们传奇般的际遇,无不感叹钦羨,异口同声地说,这枫树是吉祥物,是枫树给了母女俩吉祥,给予了丰厚的利益,这栽枫树的地方肯定是个宝地!

这消息一传十,十传百,很快在乡邻中广为流传,知道的人越来越多,地域也越传越广。于是徽州一带乃至江南等地的商贾人等,都趋枫树之利,纷纷来此落户,经商。这里的店铺、作坊应运而生,渐渐形成一个繁荣的海滨市集。人们都认为“因枫树而得丰厚之利”,故曰“枫利”。

关于古枫的掌故,据修纂于明洪熙元年(1425)的本地《马氏宗谱(致忠堂本)》,记载其宗族,因明初燕王朱棣起兵“靖难”,而被迫从苏州阊门山塘街渡江避难于海隅古丰的经过。在追念始祖马昌谏文中,有“烬竹苞于苏郡,寄萍梗于臬城,托迹枫林高且古,怡情坳水兮秀且清。坳水东,枫林西,至今阊阖增辉,如鸟斯革,如翬斯飞”的内容。马氏北迁二世马德,后在永乐元年(1403),“官给盐场灶荡,任(丰利场)二十四、二十五两总办,纳本邑盐引,永乐年间考试灶籍,从此



文园古楼

民、灶籍分别。”马姓后定居于古坳与丰利之间,从以上文字看,丰利其时不但确实载有枫树,还是“高且古”的枫林,颇令人遐想。

古镇“土风淳厚,人自足于鱼盐”,但并不影响其对精神文明的塑造与享受。明清之际,受徽商文化的影响,其在江海大地上更是一花独放,令人瞩目。

清乾隆中,丰利文园独步江淮,名闻遐迩。生性儒雅的汪之珩在商向儒,轻财好施,广交天下名士。一时,江干车马,络绎不绝,诗酒酬唱,享誉文坛。当时扬州八怪中有多人与之交往,其中莫过于著名的文人画家郑板桥。乾隆二十五年(1760),郑板桥受汪之珩之邀,来到古丰文园,与主人共度七夕,前后盘桓匝月。期间,他受荫深园主刘柳村所请,写下1438字的《刘柳村册子》,半月后又兴趣盎然写下《板桥自叙》。七夕这天雨后初霁,傍晚,汪之珩携客人登上文园竹楼,楼台上弹棋间设,丝竹并奏,园中美景尽收眼底。文酒之会,诗为媒介。主人汪之珩兴致极高:“风雨连绵直到秋,欣逢晴夕共登楼。”“儿女无端笑口开,跪呈瓜果满凉台……”一下子连咏四首七绝。王竹楼、郭琅亭、黄瘦石雅趣共生,各有诗作相和。郑板桥更是诗兴大发,挥笔畅书:“我住文园,是六月,匆匆赴约。其中有绿蕉窗子、碧梧亭阁。暑雨数番池上晚,夜星一片波中落。更湘帘不动,晓风轻,看鱼乐。书与史,拥城郭。丝与竹,调官角;又主人佳句,耐余咀嚼。海上文章高且阔,长年骨干清而削。笑老夫终日说才华,今朝弱。【客文园题赠汪璞庄观察一首,调寄《满江红》,乾隆庚辰七月十五日板桥郑燮草稿】。遥想当年这场盛会的情与景,堪称古枫文化之盛事,不由令人击节赞叹!名人到访,自然也少不了与枫树有关的故事。

或言,郑板桥是刘柳村的亲戚,他到访丰利并非一次。住文园,访荫深园,还在主人陪同下游览过古利大圣寺。这一天,一行人过了运盐渠上的迎龙桥,来到北街面南而立的关帝庙,又转过弯子口,梵呗之音缥缈而至。映入眼帘的是,大圣古刹庄严肃穆,寺旁的古枫巍立如华盖,恰好倒映在盐河头的水中。时值深秋的傍晚,晚霞如胭,枫叶如丹,盐河码头下碧波粼粼。一阵晚风吹过,形成片片涟漪。面对这如诗如画的美景,郑板桥雅兴顿发,脱口赞道“夕阳古枫”,并留下墨宝。由此古镇又多了个雅称——“古枫”。

对于“丰利”二字来历的考证,那是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。归纳之:一是此处乃风水宝地,“孽货盐田”,获利丰厚,且认为是枫树所赐,寓称于“丰”;二是地临黄沙洋,历史上虽屡受潮灾摧残,但“亦有邀天保护时,潮声抵岸迴风障。”守护住家园,心存感激,乃归结于地方好,大吉大利;三是地处海疆,常受倭寇、海盗欺凌劫掠,但与邻场相比,有时能侥幸逃过一劫,遂有人题写“古丰福地”匾额,高高悬挂在颇有影响的都天庙里。如此不亦而足。

丰利地处古扶海洲的北缘,有资料显示,唐贞观年间(627——649)名沿海村,隶淮南道广陵郡。自从扶海洲上来了拓荒的“流人”,“人烟之初,即为鱼盐之始”。可以想像,当时那些先民们面对大海,在恶劣的环境下将一面面的治卤亭场建起来,需要多大的勇气?然而,这里滩涂开阔,卤气易升,潮汐可到,适宜构筑亭场摊灰淋卤,又有一望无际的蒹草可供取用,是煮海的绝佳去处。尽管这里面对黄沙洋,潮汛乖张暴戾,最大潮差可达三次,远大于邻近海岸的潮差幅度,但先民们最终还是迎着汹涌的波涛,选择了坚守。

大约在公元7——9世纪的中唐及其后,扶海沙洲上煎事渐旺,煮盐的灶火常常映红夜空,曾惊动当时路过的日本遣唐使船队。后来,随团的圆仁和尚从水路经如皋赶往扬州,他在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中

记述了沿途所见:“官船积盐,或三四船,或四五船,双结续编,不绝数十里,相随而行,乍见难记,甚为大奇!”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时包括丰利、掘港沿海诸亭的生产能力与规模。

五代时,南唐小朝廷采用“息兵安民”之策,曾偏安东南一隅,全仰盐课立国。当时徐复治海陵盐政,检烹炼之亭,见成盐过程,联想到转手化为国帑。遂叹其为金卤,特建亭以志之。后来,嘉庆《如皋县志》记其事,言徐复当年所至,马塘、丰利乃其地。也可证明其时本地制盐业之盛。

北宋开国前后,其统治集团深谙其道,立即在两淮盐区着手整治鹺政,设立催煎场。

据明弘治《两淮运司志》:“(上)十场建制沿革,俱在本司东北禹贡扬州之地、汉海陵之东,地属煮海之地,唐已置场与官。其丰利等十场名未知始于何代?宋一场十灶,盐课、盐场多增,俱属丰利监,各场名或始于宋初……”

《两淮运司志》是现存最早的盐法志,八卷本今存残本四至七卷,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但在上段引文中,对当时十场(隶通州分司)尤其是丰利场的沿革表述,概念却十分模糊,有必要加以厘清。

首先,“唐已置场与官”,乃指文宗大和五年(831),析海陵县东境五乡置如皋场,管理盐务。此五乡无考,但并非专指盐亭,当时的如皋场应是涵盖盐区的行政区划,亦或兼有盐斤卖纳之职。直到南唐保大十年(952)如皋正式撤场设县,前后历经121年。

其次,丰利建场应该在保大十年以后至北宋初年这段时间。因保大十年如皋场还在那里,岂能重复设场?在南唐(937——975)灭国的前一年,即宋太祖开宝七年(974),北宋政权将泰州海陵监移治如皋,就近管理沿海南四场、北四场。据相关史料,其南四场乃丰利、掘港、耕茶、角斜四场。这是丰利正式以“催煎场”的身份进入角色,按当时的规制,它大体管理10座盐亭的生产。

与当时各场命名一样,丰利场的命名并非“急就章”,丰利作为地名应该是早就存在的。与邻场名称含义稍有区别,“丰利”两字的出处明显与盐利丰厚有关。这也与后人对其建场早于邻场的推断,以及它后来引领上十场的排序是相符的。另外,从本地民间珍藏的一套家乘——《秦氏家谱(笃志堂本)》,世传中,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:“秦氏肇基于丰利也,晋中书令兼枢密使维汉之兄维聪,於宋开宝八年自吴徙居丰利,由监入籍盐亭。”此段宝贵的资料真实记录了秦氏从江南徙居江北,由民籍进入灶籍的经过,也印证了当时盐政管理体制上“亭”“监”之间的关系。同时从侧面佐证“丰利”作为地名可上溯到“五代”乃至中晚唐。

至于“丰利监”,本称“利丰监”,明代盐法志习惯称其“丰利监”。

北宋初年的地理总志《太平寰宇记》有如下记述:

“利丰监,古之煎盐之所也,国朝升为监,在通州城西南三里,管八场。四至:东去大海一百八十里,西至泰州陈堕港四十五里,南至大江口一十里,北至通州三里。

管八场:西亭、利丰、永兴、丰利、石港、利和、金沙、余庆。”

据此可知,利丰监的地域在当时的江心沙洲上,北至通州(州治)尚有三里。在所辖八场中,赫然列有一个丰利场,它与海陵监的丰利场南北对峙,相隔百里。这里为便于叙述,我们姑且称它们为“南丰利场”与“北丰利场”。沧桑变化乃是正常规律,随着江心洲的连岛成陆并向北淤涨,原在江中的狼五山也在此段时间陆续“登陆”。到了南宋绍兴年间,利丰监所辖之场有的逐渐丧失煎盐条件,不得不加以裁并,其中就有南丰利场,它与西亭场组建成西亭丰利并场。从此,南丰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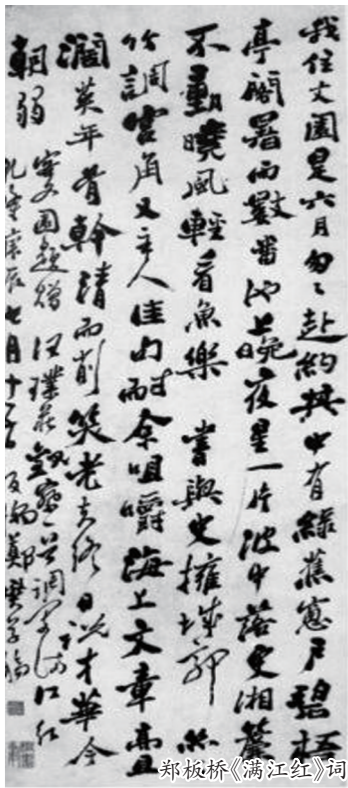
场归于湮灭,(前后存续大约200多年)。利丰监明代也改设为“两淮都转运盐使司通州分司”。而“北”丰利场从来就与利丰监没有从属关系。

由于当年《太平寰宇记》的作者乐史撰稿时,详载利丰监所属各场名,而对海陵监的南四场、北四场均未列场名。作为宋代一部有影响的地理志书,客观上造成南丰利场一时为世人所知,北丰利场在史料中时隐时现,加之明朝以前盐志的缺如,造成部分人对其沿革概念的模糊。明弘治《两淮运司志》“其丰利等十场名未知始于何代?宋一场十灶,盐课、盐场多增,俱属丰利监……”这段叙述也明显发生错误,它把明代仍存续的“北丰利场”当成南宋已裁并的“南丰利场”,因而武断地将时属海陵监的丰利场划入了利丰监。

阴差阳错,古人的疏忽也误导了今人。修纂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本镇方志,不止一处有所涉及:“丰利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为利丰监八场之一,设盐场催煎使一人。”又,“丰利市场悠久,据宋《太平寰宇记》载,通州利丰监有八个盐场,丰利盐场属八场之一”等等。把历史上两个“丰利场”混为一谈,因而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发生了严重的偏差。

古代,皋东地处泻卤之地,交通闭塞,信息不畅,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,地名有所雷同并非怪事。上世纪中叶,本地民间就有所谓“东马塘、西马塘,南丰利、北丰利”之说。只是到了近年,才渐渐被人遗忘。至于“南丰利”的地名后来虽然隐入历史的幕后,但其地并未消失,有专家考证就是今天的“刘桥”。

历史有时也会捉弄人,然而,当人们一旦弄清事情的原委,则应还



郑板桥《满江红》词

其真实,这才是科学的态度。

丰利诞生在古扶海洲上,她最先从煮海走来。在一千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,先民们辟路蓝缕,薪火相传,在滩涂上用双手营造家园,尤其把渔盐之利发挥到极至。劳动创造了辉煌的物质财富,劳动也孕育了许多富含地方特色的文明成果。丰利的历史源远流长,丰利的文化多姿多彩。丰利人憨厚朴实,虽略显保守,但血脉中注入了先民们勇往直前,坚忍不拔的基因。丰利人热爱自己的家园,守着故土寸步不离的姑且不说,即使客居异乡经年亦或远行的游子,心中始终有一个牵挂——江海平原上有个曾经号称“福地丰利”的古镇,就是自己的衣胞之地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—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引下,在共筑中国梦的同时,努力开创古镇新的更加美好的明天!

祈福丰利!



鹽亭沙盤